

莫洛托夫秘谈录

——与莫洛托夫 140 次谈话

(菲·丘耶夫日记摘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莫洛托夫秘谈录

——与莫洛托夫140次谈话

(菲·丘耶夫日记摘编)

刘存宽 李玉贞 等译
薛衔天 陈春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北京

(京)新登字028号

莫洛托夫秘谈录

——与莫洛托夫140次谈话

(菲·丘耶夫日记摘编)

刘存宽 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 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密云华都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开本 18.625印张 482千字

印数: 0001—5000

1992年3月第一版 1992年3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50-238-4/D.46 定价: 9.4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内部发行)

译者：刘存宽、李玉贞、薛衔天、
陈春华、郭兴仁、吴永清、
韩世滋、刘利民、李 丹。

校对者：李玉贞。

统 稿：刘存宽、薛衔天。

译者前言

众所周知，莫洛托夫是列宁和斯大林同时代人，是苏联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也是叱咤国际政坛风云的屈指可数的外交家之一。因此莫洛托夫访谈录的出版很快引起了苏联和世界范围内各有关方面的广泛注意。

《莫洛托夫秘谈录》(在征订时称《莫洛托夫回忆录》)是苏联著名诗人菲利克斯·丘耶夫访问莫洛托夫日记摘编的中译本。从1969年—1986年，也就是莫洛托夫生前的最后17年，作者与莫洛托夫谈话139次，算上向莫洛托夫遗体告别词，计140次。作者对每一次谈话内容都做了详细的记录，编成了计达5000余打字页的“莫洛托夫日记”，收入本书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内容。作者编辑本书用了21年，至1991年才由莫斯科“大地”出版中心出版。

莫洛托夫不写回忆录。他说：“列宁不写回忆录，斯大林也不写”。作为列宁忠诚战士的莫洛托夫不屑此为，因而他没有留下回忆录之类的著作。丘耶夫也一再指出，“载入本书的不是莫洛托夫回忆录，而是活生生的谈话”，书中“所说的都很有保密性，要是莫洛托夫写回忆录的话，也许不会写进书里去”。这就是说，本书收入了一般回忆录中通常不写入的重要内容。

本书内容，除作者少量补充外，绝大部分均引自莫洛托夫原话，作者不加评论；对莫洛托夫每一条谈话内容，作者反复询问，力求准确；对一些敏感问题，包括对莫洛托夫含有“挑衅性”的问题（例如，作家阿布拉莫夫对莫洛托夫的提问）和莫洛托夫对戈尔巴乔夫的批评，也不回避。可以说，本书是莫洛托夫谈话较为真实的笔录。因此，作者又将这部日记体的访谈录称为“莫洛托夫日记”。

莫洛托夫生于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的1890年3月9日，

逝世于戈尔巴乔夫当政时代的1986年11月8日，先后经历了俄国和苏联11位国家领导人。他有82年苏共党龄，经历了27次苏共代表大会。他是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的领导成员之一，1920年入苏共政治局，是列宁的战友，列宁之后，又长期充当斯大林最主要的助手，主管苏联的行政和外交事务。他同斯大林一起领导了苏联卫大卫国战争，参与了确定战后世界格局的一系列国际重大事件。他的经历象圣诞老人一样丰富，他的名字同苏联历史密不可分。因此，他的谈话涉及到苏联政治、经济、军事、党务、国际事务、社会生活、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重大问题。这部访谈录对于一切关心国际政治和从事苏联历史及国际关系史研究工作的人参考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这是我们翻译这部访谈录的目的之一。

此外，莫洛托夫谈话的核心思想并不在于追述他自己近1个世纪的荣辱史，而是把自己的目光专注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和命运问题。他说：

“我的主要使命不是撰写一部内容可信的历史书，尽管这是非常巨大和非常富有责任感的事情。更为重要，更为困难，令人难以胜任的任务是恢复和继承列宁、斯大林的事业。而这不仅会载入史册，还更要面对未来。

用未来和现在的观点去分析过去，我认为这很重要。当然，这个任务我胜任不了，力不从心。我认为现在应该帮助人们找出较正确的方法来完成这项任务。”

现在东欧发生了巨变，苏联也已经解体。在当今情况下看看莫洛托夫是如何观察苏联国内情况和国际形势的，他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指出了一些什么重大问题，这些重大对苏联社会和国际局势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想必更会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这对于我们认识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的原因，也不无益处。这是翻译本书的又一方面的动机。

为了使读者更准确地了解本书内容，我们在一些地方作了必要的注释。

译者 1992年1月

作者的话

……我乘坐电气列车从白俄罗斯火车站^①出发。对面坐着一个小男孩。他在蒙着水汽的玻璃上写数目字，仿佛想猜出他的寿命有多长，虽说他未必想到这一点。不知为什么，我蓦然觉得这个男孩将活到2060年。 he现在是12岁。以后我再也不会见到他，即使见到，也许会认不出来。他也会是这样的。但是，他命中注定知道的事要远胜于我。现在令我焦虑不安的一切，到他身上将会更加心平气和，更加明朗和无关痛痒。我早就打算把这些感受诉诸笔端，尝试着做到“不怨不怒”。

我五岁学会读书。家里仅有政治书籍和《真理报》。我很早即对政治发生兴趣，然后又对历史发生兴趣，而且这种兴趣长驻不衰。可能因此之故，生活赐与我许多机会，见到为数众多的政治活动家、国务活动家、军事活动家，以及学者和英雄人物。回忆和日记使许多人的鲜明个性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们是：A·E·戈洛瓦诺夫元帅、Г·K·朱可夫元帅、海军上将H·Г·库兹涅佐夫；国务活动家K·T·马祖罗夫；科学院院士A·A·米库林、C·K·图曼斯基和A·M·柳利卡；飞机设计师A·C·雅科夫列夫、A·A·阿尔汉格尔斯基；飞行员M·M·格罗莫夫，M·B·沃多皮亚诺夫和A·H·波克雷什金以及其他许多许多的人——其中每个人的事迹都可以写成一本书。

在我脑海中，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尤为突出。在他生前的最后17年中(1969——1986年)，我定期和他会晤，有详尽记录的谈话达140次，每次平均四、五个小时，不管

^① 莫斯科一个火车站的名字。——译者

人们对莫洛托夫持何种看法，他的见解也具有权威性，他的阅历与国家的历史密不可分。他曾和列宁共事，是准备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的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他在党和政府中身居高位，领导我国的对外政策，几乎与本世纪所有名流巨擘都有交往。

他的见解是他本人的，在许多地方和当前发表的肯定为真理的那些东西背道而驰，但是在17年的经常交往中，我有机会在某种程度上研究这个从青年时代就服膺于理想的人。毫无疑问，他说到的很多情况是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现在难以确证和检验。因此我将引用他的话，力求不加评论。同莫洛托夫的谈话题目五花八门，涉及我国十月革命后历史上一些最紧急的时刻。这是同莫洛托夫谈话的摘要，是我们谈话的日记。这里仅是我五千多打字页的“莫洛托夫日记”中不大的一部分。是的，所有这些年我经常写一些日记，详细记录每一次谈话，每一条意见，而在最后的几次会见中，我反复询问，以求准确……

载入本书的不是莫洛托夫的回忆录，而是活生生的谈话。由莫洛托夫述说，但非口授。从他口中“挤出”一些看法来可是很不简单，特别是在我们认识的初期。有些事情莫洛托夫首次谈及时并没有展开，5年、10年、15年后还要再次谈起……

他对事情的看法一直不变。他是我行我素。问题的角度会变，但回答的程度还是依旧。因此书中有些段落标示了几个日期。

到他那里去总是应当有所准备，若打算问什么，先要知道背景知识，记住一些文件。还有，我和他的会晤时间都不短，也很频繁，但我每一次都没有忘记这是莫洛托夫。

……他回答问题时反应敏捷，令人瞠目。谈话开始时他通常很少说话，而是多听和提问。但在谈话的后半段，他就开始讲一些任何时候从任何人那里都听不到的事情。你看他面颊绯红，眼睛眯缝着，像年轻人一般炯炯有神。

有时莫洛托夫好像因为旧时的回忆而激动起来，开始有些口

吃，但他不在辅音上停顿，而是把某个词的第一个音节或是单音节字的整个字重复上两三遍。他有幽默感，但就我看，他不喜欢说笑话，虽然有时也说说。他懂得诗歌，记住不少流行歌谣和伏尔加歌曲。乍看起来他可能显得干干巴巴的，但是他善于和不同文化层次和不同教养的人交往。

我和他谈话时，不知不觉地留心自己的思想和言谈，养成了谈话简明扼要条理清楚的习惯。他和他的老师都容不得说话冗长。莫洛托夫表达思想准确，有时似乎对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吹毛求疵，喜欢刨根问底，说话固执，不出尔反尔。他很少谈起他自己。

“俄罗斯帝国的监狱您都蹲过吗？”

“是所有的大监狱”——他当即加以准确化。

1985年我写了一篇有关他的特写——没有回避任何敏感问题。他过目后，总的表示同意，仅提了很少的意见。我把这篇特写投给《真理报》，可是他们回答说，他们不登本刊前同仁的材料。的确，1912年4月22日，莫洛托夫参与了《真理报》创刊号的出版……

他知道我要写一本关于他的书。他本人没有留下回忆录。他说道：“谁在什么地方说了什么，谁往什么地方吐唾沫，我不感兴趣……列宁不写回忆录，斯大林也不写……说看过我的书的人，自有人在。我写的不是回忆录，而是写社会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如农民所说，‘这对我们有什么用处’。”

我当时不知道这种会见还能有多少次。会晤日渐频繁时，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他了吧。因为还在1969年我第一次到他家的时候，他已是80高龄的人了。他中等身材，筋骨强壮，前额宽大而固执，深棕色的眼睛，目光尖锐明亮，没有因岁月流逝而暗淡无光。胡须又白又硬——在他的时代，政治局委员们全都留胡子。

我们的会见是怎样进行的呢？通常是我到郊外的茹科夫卡去，他在外室迎接我——很亲切，不拘礼节。

“是谁呀？是菲利克斯^①同志来了吗？”

我们坐在桌旁，共进午餐，到树林去散步。（‘我过去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就这样，我也常被人窃听。我们散步去吧……’）我们头几次见面中他说话不多，回答问题很拘谨——大致像后来当着不太了解的客人说话那样。往后，说话就多一些。

他的谦虚、敏锐和俭朴十分令人瞩目。他很仔细，不白浪费任何东西，例如，在其它房间若没人，他就不让开灯。他的衣物穿用时间很长，现在戴的帽子，穿的大衣还是他在政府工作时照片上的那一套。在家穿的是一件织得密实的咖啡色衬衫，衣襟在裤子外面。过节时才着灰色服装，结深色领带。

我第一次见到莫洛托夫是在1955年，我那时还是少先队员，去参加当时以莫洛托夫命名的全苏共产主义少先队克里米亚健身营30周年的活动。我没想到过些年会生活在莫斯科，由熟人把我带到格拉诺夫斯基大街，在他家里再次见到他。这时他已是另一种身分——领取退休金者，被开除党籍了，但是他还矍铄，精神乐观。原来他知道我的诗，那时我因这些诗受到了处分。

直到生命结束，他的记忆力一直很好，我则力求把一切记下来。我开始并无写作计划，我决定按主题相应地将它们分成几章，但是一看内容都十分相近，很多东西搅在一起。但是我找不到其它出路：不知道如何从大量材料中，在不损害其可靠性的情况下，选出读者可能感兴趣的东西。

从我的5000页日记中选出不到700页来……这本书是很不寻常的。而且我再说一遍，它不是莫洛托夫的回忆录，因为这里所说的都很有保密性，要是莫洛托夫写回忆录的话，也许不会写进书里去的。

我没有按照编年顺序安排这些谈话记录，而是尽可能按问题处理，因此，分别在许多年代说的一些话就可能合在一起。我把

^① 本书作者丘耶夫的名字。——译者

日期保留下来，——对我来说这些日期很宝贵，有纪念意义，而读者又会得到一个大致轮廓，知道他是在什么时间讲述这些事件的。这是一本日记，我力求对它不作修改，也不加以润饰。其中也许有不准确和重复之处，但在我们会见的年代里就是那样记下来的。

……不过，从这些日记里仍然可以看见往事的脉络。在我们家里，莫洛托夫在那时的所有领导人中间似乎是最受尊敬的了。斯大林不言自明。斯大林是神。无论就职位上还是在人们心目中他都是至高无上的。不管人们怎么说，事情就是这样。莫洛托夫仅次于他，而且似乎不仅在我们家是这样。我们几个朋友都取了“斯拉夫卡”的名字^①来表示对他的尊敬。而这并不是靠党的任何指示灌输的结果。

1946年我5岁的时候津津有味地读了莫洛托夫在联合国的演说。直到如今我还能熟背一些段落。我的父母把我国坚定不移的外交政策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这种政策那时深受赞扬，唤起人们对祖国的自豪感。

1954年我在少先队营地收到妈妈寄来的一封信，我把它保留至今，其中说：“你大概知道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从日内瓦给我们带来多么巨大的喜讯，——这是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大喜事……”这是指越南战争结束了。人们谈到这个陌生人、这个政府委员时，就像说到亲人一般……

我的父亲此时已不在人世，过了一年妈妈也去世了。伟大卫国战争的一个光荣飞行员和一个普通女性为祖国牺牲了健康。他们分别活了37岁和34岁。他们是普通人，他们诚实地工作，我们家里没有出过任何风险。过了几年，我第一次看见我外祖父。他在30年代受到过迫害。他讲的内容和我谈到的关于“集中营”问题的材料不一样。不过这是另话了……

① 这是因为莫洛托夫的名字叫“维亚切斯拉夫。”——译者

如上所说，我第一次见到莫洛托夫是在克里米亚全苏共产主义少先队健身营。我站在离他很近的地方，甚至碰到了他的衣袖。他讲演的时候我给他照了相。那时我才14岁。我们在被聚光灯照得通明的健身营科斯特罗夫广场目送他离去，一面唱道：

亲爱的莫洛托夫
时刻记得我们，
他的功业说不尽……

又过了14年，当我来到他住宅的时候，他在那张照片上为我签名留念。我们的会见频繁起来，一直持续到他的逝世。似乎是命运把我和这个人连在一起。那个“健身营”是用莫洛托夫的名字命名的，后来我又在莫斯科莫洛托夫动力学院毕业……

我不打算对他本人、他的口述及结论进行评价，也不想对他从事政治活动的那个时代进行评价。我想，这为时尚早。

我不曾见过他工作时的情景——不知道这位40年在上层、30年当国家第二号人物的人他是怎样工作的。

他是怎样一位外交家和政治家——这方面的情况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家已经述及。我从他的同事——那些老外交部官员处得知，列宁曾想让莫洛托夫领导外交人民委员部，而且契切林向斯大林提出过建议，由他做这个职位的候选人。

特命全权大使B·C·谢苗洛夫说道：“革命后由列宁、斯大林、契切林负责处理对德政策，以后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他们喜欢青年，有许多年轻人在外交部工作”。

我不知道他在外交战线上的情况，可是，他当然没有在联合国用鞋敲桌子。他在国内的活动情况，已经写出了不少东西。一些人认为他唯斯大林之命是听，是罪人，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革命的锻造者”。^①

① 莫洛托夫这个名字在俄文中是“大锤”的意思，故有此说。——译者

无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反正是二十世纪最重大事件的目击者和参加者。虽然时过境迁，这些人的经历却总是有趣而重要的。一切都变新了。马涅日广场那个几十年间闪闪发光的“共产主义必胜！”的标语也给拿掉了。

作家费奥多尔·阿布拉莫夫几次请我为他引见莫洛托夫。我没法说服莫洛托夫接受（他不喜欢接待生人）。他和谁处得熟，就和谁来往。不过有一次，我“心血来潮”，甚至把一些显然反对他的人，一些熟悉情况的、有充分准备的、仇恨斯大林及其左右的人拉到他那里去。莫洛托夫照常四、五个小时地回答所有“尖端”问题，虽然每人都各持己见，但是谁也没有在争论中获胜。

费奥多尔·阿布拉莫夫还是打入了茹科夫卡的别墅，而且向莫洛托夫提问：“您相信共产主义吗？”

对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来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了解他的世界观的关键。他不只是单纯地相信，不仅仅是信，而且是坚信，并且按自己的理解身体力行，以促进这个目标的实现。他衡量每一个事件均以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为标准。

当我问他“列宁的最大特点是什么”时，他答道：“目标坚定”，并补充说：“列宁的每一件工作都是挖帝国主义的墙角”。

他从不放弃原则性，他所说的，并不只是企图为“一个不可救药的斯大林主义者”辩护。不，这是坚定的信念。在所有这些年里，我没有发现他有任何辩护的意图。他是一个有主见的人。他对任何问题都有自己的固定看法而且贯彻始终。他不理解，如果一个人坚信某事，他怎么就不能坚不可摧。当他认为某事是党的需要，是工人阶级事业的需要时，他可为之赴汤蹈火。他本人在不同时期都曾出生入死，在所不惜。就说1942年他越过德国占领区上空飞往伦敦和华盛顿的事，那该冒多大风险啊！

只要做事情，就会有是非有功有过……对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予以褒贬——一切均取决于议论者持什么立场。我觉得像莫洛

托夫这样的人，许多人都在用自己的尺度去衡量。悲剧的部分原因即在于此。

人们对善恶的理解各不相同，所以我并不考虑人们会怎样看待我日记中的莫洛托夫。我国历史上同一件事实或事件，在有些人那里引起愤怒，而另一些人则对之拍手称快。

我的目的是真实可信地把我听到的和记下的东西提供出来。

“你们俄国人真古怪！”我认识的一个德国人对我说，“你们给打败希特勒的斯大林抹黑，却抬举卖国贼……”

我记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件事，那时候一名德国党卫军首领把两名俄国将军——A·A·弗拉索夫^①和A·И·邓尼金^②领进自己的房间。

“我不认识这个将军”当有人向邓尼金介绍弗拉索夫时，邓尼金说道。

“不用说”，党卫军分子说道，“您们在不同时候打过同一个敌人布尔什维克”。

“可是我没给他们干事呀！”邓尼金答道。

……照我看，一个为正义而奋斗的战士，无论是谁，一旦他变节，他的人品也就完了。

问题就是这样多……可是，如果斯大林一人甚而连同当时全体领导人都有过错的话，那么这个人或这一伙人该具有多大的魔法般的摧毁一切的力量啊！这就是您们的“英雄与群氓”说了。不，靠一个或几个这样的人，若没有一个坚强的党和国内绝大多数居民的支持，想必做不到这一点。至于人民，他们从来别无选择，至少，无论今昔高层领导就是这样对他们说的，而如今则断言，除了改革别无选择。

有人写道，斯大林欺骗了人民，威胁、恫吓……为何人民竟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人俘虏后投敌的苏联军官。——译者

② 苏联国内战争时期在南俄及乌克兰活动的白卫军头目。——译者

然如此易受欺骗和被吓倒，那么对人民又该做何等评价呢？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无论斯大林，还是莫洛托夫，当列宁在世时都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列宁的小集团，这在高级领导人中是不多见的。若研究那个时期，你并非一切都能搞明白。有许多事情难以理解，更难为之辩解或予以宽恕。我们要仔细地分析、研究文件，听取不同的意见。

然而，我们的许多同胞，尤其是我的同龄人和比我年长的那些人的健忘，却令我叹为观止。比方说，不言而喻，至今我还十分清楚地记得四、五十年代报纸上提到的那些事件、说法、姓氏和日期。不久前我从电视上看到，一个过去有名的军事检察官说他以前不知道列宁在遗嘱中对斯大林的评价。我在四十年代孩提时就读过这篇遗嘱。我父亲的书架上有几种政治书籍，其中的一本，1936年出版的，援引了列宁遗嘱中最尖锐的段落，而且附有斯大林的注释说明（《联共（布）党史研究文集》，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印数为305,000册）。我不记得这在当时会有很大意义。这本已经变黄的书如今仍在我手里。在苏共第20次和第22次代表大会的神圣讲坛上有人说似乎斯大林隐瞒了列宁的遗嘱，我感到气愤，便在会后把这本书拿给我的熟人们看。他们这些成年人好奇地翻阅这本书，阴沉沉地一言不发。这样，我在15岁时就对赫鲁晓夫产生了不信任感，我想亲自查阅历史。而且，除了街坊以外，没有人指导我，确切些说，我是自学，因为我是在没有双亲的情况下长大的，还要教育年幼的弟弟。

我突然产生一个念头，我在其领导下生活的所有领袖都骗了我，除了斯大林以外。不知道什么原因，人们都相信他。至少我在他当政时度过的那12年间我记得是这样的。现在许多事情为人所共知了，公开了，可是我已经说过，我做这些笔记是在很久以前，对于我来说，这些笔记是现在出版还是过一百年出版，是毫无意义的。我不希望制造廉价的轰动效应，因此我不急于以本书来追求时尚或超越时尚，我对自己写的诗就是这样对待的，其中

有些是写成以后过了二、三十年才发表的。虽然这些诗已经引不起轰动效应，但对我来说是重要的。我编这本书就用了21年，而我并不着忙：等所有人都不想再读这个题目的著作时，再让它出版，那会更有意思些。我保存着永恒的东西，或比如说，在电气列车上坐在我对面的那个男孩……

我在《星火》杂志上看见有人著文称那张《列宁和斯大林在哥尔克村》的著名照片是剪接成的，是伪造品。我立刻记起我和莫洛托夫翻阅1922年9月24日《真理报》插图副刊的情景，那是第一次刊登这幅照片。列宁是读这个报纸的。这样一来这个剪接就成了在列宁生前干的吗？当代的仇恨心理简直是让人无所不为……

我们坐在桌旁。窗外是俄罗斯明朗的冬日。莫斯科郊外是高大的雪堆。树林、灌木、屋顶积满了雪。……

“并非一切都尽如人们想像的那样”，莫洛托夫说，“许多事情其实是走了样的。许多事情干得非常好，但是现在不够了。你们是坐享其成，但是还要努力工作呀。”

他在说，我却看着列宁葬礼的照片：斯大林被伊里奇的沉重灵柩压得弯腰驼背，并排是莫洛托夫，他年轻，肩膀有力，扛着……领导者们像国家一样都还年轻……

莫洛托夫在茹科夫卡国家别墅度过了他最后的20年。他的妻子死去以后（И·С·热姆丘任娜死于1970年），有两个很关心体贴人的殷勤女人——他的内侄女萨拉·米哈伊洛夫娜·戈洛瓦涅夫斯卡娅和塔季杨娜·阿法纳西耶夫娜·塔拉索娃照料他。两个人称得上是他的慷慨的殷勤的管家。

我们通常从中午12点谈话到下午4点钟。

“吃点菜汤和面包吧！传统的俄国饭。我从幼年起就吃这个。切一块黑面包蘸点菜汤，吃吧”，莫洛托夫说，“请吃梨，广播说这是从格鲁吉亚给我们送来的！倒点白兰地吧，斯大林说这是打底子！我可以喝一点点。该收掉这个空瓶子了。米高扬说过：

‘空瓶子带煤油味’”。

绍塔·伊万诺维奇·克万塔利阿尼参加了我们诸多会见的一半，确切说，在140次谈话中，他参加了从1970年到1977年的70次谈话，他是学历史的，为人非常善良，性格明朗好动。他于1977年出其不意地故去，享年不到50岁。这本书怎样开头，他同我全商量过，他给本书的开篇出主意说：“你这样写吧：就在白俄罗斯老火车站……”

莫洛托夫此后差不多又活了9年，不过后来我从白俄罗斯火车站到他那里去时，已经没有绍塔·伊万诺维奇作伴了。到这里来的有一些老作家、朋友、学者、军人，但来人的范围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我们在莫斯科会见的这些年里，最权威的机关里几度流传过莫洛托夫的死讯。我总是立即往茹科夫卡打电话：

“可以请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接电话吗？”

“我就是”。

这样的事有不下三次。我去到他那里——在别墅小房间的窗户里能看见他头的影子，他正在工作呢。

“我是十九世纪的人”他说道，“步入新世纪时人们曾是多么迷信啊，什么都害怕！”

他活到了“飞碟”和党实行改革的新方针与加速发展的时代。他给救济切尔诺贝利列宁核电站受难者基金会汇款100卢布，我见过1986年6月18日汇款的收据。

我离开他到莫斯科去，他站在门洞那里，抓住门框。那是忧郁、忧郁的送别的目光…

“在我们的道路上当然会出现挫折与失败”，他说，“但是帝国主义毕竟是要垮台的！”

他于1986年11月8日以97岁的高龄逝世，正是在69年前的这一天，他和列宁并肩站着，宣布了苏维埃政权的成立。我们发现了他的遗嘱。在一个信封里有个存款折：500卢布的安葬费——